

合肥张家四姐妹的传奇人生

民国世家，除了站在权力顶端的“宋氏三姐妹”，还有文化界声名卓著的“合肥张家四姐妹”。

1906年，四姐妹的妈妈陆英嫁给张武龄时，可谓一场世纪婚礼，光是抬嫁妆的队伍便足足排了十条街。张武龄和陆英婚后总共生了四个女儿五个儿子（后来陆英去世，张武龄再婚又生一子）。

“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他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说这话的是著名文学家叶圣陶。后来，四姐妹的四位夫婿果然各有不凡，成就了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

抗战胜利后，张家孩子齐聚上海大团圆，前排从左依次为张充和、张允和、张元和、张兆和。



张元和与顾传玠



张允和与周有光



张兆和与沈从文



张充和与傅汉思

张元和 “大夏皇后”情落昆曲名家

大姐张元和文静端庄，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。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有“大夏皇后”之称，追求者自然不少，但却无一人入她法眼，直到后来结识了风流倜傥的昆曲名伶顾传玠。

二人的相识颇具浪漫色彩。元和一直痴迷昆曲，当时她正与二妹允和等一些女孩子学唱《牡丹亭》中“拾画叫画”一折。这段近半小时唱念，正是顾传玠的

拿手好戏。但顾传玠当时在上海唱《牡丹亭》却没有这一折。张元和便给顾传玠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能加演这一折。顾接信后很快就回复，同意在大世界上演“拾画叫画”一折——于是便有了张元和与顾传玠的初遇和相恋。这一年，张元和22岁，顾传玠20岁。

当时，优伶的地位非常低下，两人的婚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上海小报都用“张元

和下嫁顾传玠”作新闻标题。

1949年5月18日顾传玠带领全家去了台湾，再也不曾登台演出，偶尔在家中唱戏，扮演的多是悲剧角色，听众只有张元和一人。1966年，顾传玠因肝病去世，悲痛不已的张元和手书《昆曲身段试谱》，作为对他的纪念。顾传玠去世后张元和致力于弘扬昆曲，80多岁时她还客串了王颖导演的电影《喜福会》。

张允和 鼓励丈夫共同创造幸福

四姐妹中老二张允和的出生很惊险，她出生时还不足四斤，被脐带绕脖子三圈，祖母坐镇指挥一群仆妇喷了108袋水烟，好不容易才把她救活。

张允和结婚最早，她与周有光的恋爱可谓水到渠成，波澜不惊。当时两家都在苏州定居，周

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中读书，与张允和是同学。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，与周有光自然而然也就认识了。后来周有光到杭州教书，恰好张允和也到杭州借读。就这样在美丽的西湖边，张允和和周有光开始了恋爱旅程。

谈婚论嫁时周有光担忧地写

给她一封信：我很穷，恐怕不能给你幸福。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鼓励他：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。等到周有光成为语言大师，成为汉语拼音的创始人之一，张允和已经80余岁。夫妻两人每天上午一道茶、下午一道咖啡，举案齐眉。

张兆和 瞬间让沈从文“沦陷”

出身好，身体好，轻轻松松就拿到了全校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；穿男装，剪短发，却是中国公学的万人迷。沈从文在操场上见到这位边走边吹口琴、边潇洒地把头发甩向一边的女生时，瞬间沦陷了。当校园纷纷传言沈先生再追不到张兆和就要自杀时，张兆和冲进胡适办公室投诉。无厘

头的校长笑眯眯地说：“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，你应该帮助他！”

半年后，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从文有一段时间生活坎坷，被老友疏离。他想不开，数度自杀；此时张兆和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，虽然每个月只有微薄的收入，但

她却用微薄的工资资助了25个失学儿童。1969年初冬，张兆和已被下放到湖北挑粪，沈从文也即将下放改造。张允和来探望他，沈从文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，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，“三姐的第一封信——第一封”，接着哭了起来，快70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。

张充和 将外国丈夫带成了汉学家

张家四姐张充和也是万人迷，她的文艺细胞受到章士钊、沈尹默的称赞；诗人卞之琳对她一见倾心，写出著名的《断章》四句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/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1940年，她在重庆主演昆曲《游园惊梦》，文化界为之轰动，

章士钊先生特赋七律一首志感，诸诗人纷纷唱和。

1948年11月，傅汉思和张充和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。一个多月后，张充和随丈夫前往美国。

二姐夫周有光说：“张充和的古文造诣比她的姐妹都高。”张充和赴美后，先是任职于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，其后在耶

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二十余年，课外兼授昆曲，成为颇有名望的学者。在耶鲁大学时，她教书法，穿旗袍，带女儿学昆曲，带着丈夫成了著名的汉学家。

身为汉学家的傅汉思曾经这样写道：“我的妻子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。”

据《三湘都市报》

民国时期火车票 售出一概不退



民国时期的火车时刻表

退票是老百姓旅行中的常事。近年来铁路部门根据不断变化的现状，对退票规定几经调整，以求尽量减少旅客损失。

如果在民国坐火车，您不需要操心这些心了。民国铁路规定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，否则车票售出，一概不退，无论是开车前还是开车后。民国火车站也没有退票窗口。这个规定看起来非常霸道，但在当时却有一定合理性，因为民国火车票没有预售制度。

从晚清时期铁路客运开始出现，一直到整个民国时期，火车票始终不能提前订，只能开车前买。民国时期主流的规定是：大站发车前两个小时开始售票，小站发车前一小时开始售票。也就是说，民国时期的铁路旅客，买票时行程已经确定，一般不会更改，自然不需要退票。退票是预售制度实行后才大量出现的。

假如旅客在开车前买了车票，但是遇到突发情况，能不能退票呢？也可以，但是很难。

民国铁路规定，如果旅客买好了车票，突然遇到疾病及其他突发情况，实在不能旅行，可以向站长申请退票。这种退票需要理由特别充分，足以说服站长。如果你找不到站长，或者无法说服站长，要想退票，基本没戏。退票也要收取手续费，具体金额是车票金额的10%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也可以退票，那就是上车没座。因为民国铁路客车不实行对号入座，都是上车自己找座。为此，民国铁路做了一个配套规定：每趟列车出售的客票数必须与列车座位数一致。如果您上车发现没座，那肯定是售出的车票超出了座位数，属于铁路方面的责任，铁路负责退票，不收手续费。

实际上，民国铁路根本没有执行上述规定的技术条件和职业精神，车票通常是敞开卖，根本没人考虑实际座位数。我们看很多关于民国人坐火车的记载，当时的客车车厢，尤其是三等车，经常是挤得满满当当，很多旅客别说座位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你想退票，乘坐下趟列车，可以，但是下趟列车情况还是如此。

就算你真去退票，也很可能退不了。民国的《社会评论》杂志登载了一个事件：民国37年，有一个老汉在京广线涪田车站买了张票。车到站后，旅客太多，他努力了半天，始终无法上车。老汉拿着车票去退票，车站工作人员打着官腔说：“有什么票退了，明天搭车！”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老汉哑口无言，呆若木鸡。挤不上车都无法退票，没座想退票，简直就是做梦！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